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1-0118-05

论沈从文的生命重造思想

张 森

[摘要]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致力于对理想生命的重造。他将“美”与“爱”作为理想生活的核心内涵,在抽象中探寻生命的意义。然而,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关,其背景和最终归宿都联系着民族人格的重造。正是由于这一现实目的的存在,他的“抽象”重构遭遇到了“具象”的冲突,这也暗示了他后期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困境。

[关键词] 沈从文;重造;生命;“抽象”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沈从文随各大学离开北平,次年4月到达昆明,自此开始了他在昆明为期8年的生活。昆明时期沈从文的创作较前期发生明显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两点是:一,传统牧歌式湘西世界基本上已经消失在他的创作中,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抒情”;二,生命重造成了这个时期思考的重心,这即沈从文说的“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对于这些沈从文在创作上出现的新质,学界近年来已给予不少关注,然而研究多止于对具体文本的分析,缺乏从其思想流变角度来作整体层面的考察,其结果是导致对沈从文后期思想理解的机械化和片面化,一是将沈从文转向后的创作视作天外来物,未能揭示沈从文后期思想相对于前期的“常”与“变”;另一方面则是忽视了沈从文后期生命重造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因而也难以准确把握沈从文这一时期思想的真正内涵。

一、重造缘起:双重孤独中的“吾丧我”

沈从文创作中的“抽象的抒情”主要起于昆明时期,但这并不是他的突然转向,之前早有端倪。这一变化的征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边城》和《湘行散记》中就已显现。《边城》是沈从文最后一部传统牧歌式的湘西小说。小说在极力构筑理想化的牧歌世界外,又不断通过各种内在和外在力量消解这一牧歌性,暗示这一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颓。除了有象征现代的“碾坊”和“走车路”对象征传统的“渡船”和“走马路”的冲击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世界内部力量对其无所不在的瓦解。小说中充满“死亡”“误会”等属于湘西世界的传统因素。比如爷爷与翠翠之间的误会;二老、顺顺误会爷爷做事“弯弯曲曲”,天保的死与他有关;甚至在二老与翠翠之间也存在误会。而小说中三次死亡紧紧相扣,进一步将爱情推向难以挽回的局面。阻碍翠翠爱情实现的,甚至不主要是外来的“走车路”和“碾坊”,而是充斥在这个世界内的传统生存方式。“乡下人”传统的存在模式在无形中将翠翠的爱情扼杀,也让心力交瘁的爷爷走到生命的终点。《边城》的悲剧与沈从文对湘西现代命运的思考紧紧相关。创作《边城》时他中途回乡,期间目睹了湘西的现状,这使他意识到这一世界正在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湘西古老的牧歌性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无力为继。《边城》无疑是他为这个世界抒写的一首挽歌。

与《边城》同一时期创作的《湘行散记》则是沈从文这次回乡的直接产物。在这部散文集中,他对湘

西及“乡下人”生存方式的反思更为明显,也更显沉痛。一方面,他明确地描写了昔日湘西在现代的侵蚀下逐渐走向变异的状况:“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型范!”^[1](第275页)如《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中已然堕落的少年朋友,《箱子岩》中腐烂乡人灵魂的跛脚什长,今日已全无浪漫的滕回生堂……面对现实,沈从文不无痛苦的说:“我俨然洞烛着这地方从人的心灵到每一件小事的糜烂于腐蚀。这些青年皆患精神上的营养不足,皆成了绵羊,皆怕鬼信神。一句话,皆完了。”如果说上述反思还是由于湘西自身的变异造成的,那么,对“乡下人”固有的生存方式的反思就直接预示着沈从文以往立场的转变。《虎雏再遇记》中“我”对虎雏身上所显现的生命强力提出了批评;《老伴》中的“我”面对另一个翠翠不无悲痛,“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潭中夜渔”一节中看到延续了几千年来的捕鱼方式,想到“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感到的是“无言的哀戚”……曾经为“乡下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原始生命强力而自豪,曾经在“乡下人”静态生命存在中看到牧歌式的宁静美好,曾经为“乡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而无比感动,如今在现代理性眼光的观照下,这一切都不再透出美好。沈从文此时清醒地意识到,“乡下人”几千年来“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他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汹涌而来的“现代”洪流面前,他们古老的命运终难以维持。

早期进入都市,以“乡下人”的自然存在方式为参照,沈从文对都市文明充满失望,而如今当他以现代理性眼光凝视“乡下人”存在时,他得到的同样是失望。“乡下人”与现代格格不入的存在方式及其必然走向衰颓的悲剧命运,终使他桃源梦断。自此后,古老的桃源牧歌式湘西世界就不再出现在他的创作中。作为沈从文前期重要的生命寄寓场所,“湘西世界”的失落对于沈从文的创作及思想无疑是不小的震动。一方面,他不得不思考究竟何为理想的人性:既不能如都市人那样沉沦在世,但也不能如“乡下人”般沉溺在理性蒙昧的状态中,对“乡下人”的失望使他意识到必须重新建构一更为合理生命形态。这无疑成了他接下来思考的重心。另一方面,湘西世界的失落也导致他身陷“无地彷徨”的境地。昆明时期的沈从文始终沉浸在由这种双重失望而来的孤独中。“吾丧我”^[2](第27页)是他对这个时期自身生命的概括。《烛虚》有对这一处境的描述:

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啭,使我感觉悲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习,又似乎完全陌生。廿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高楼大厦灯火辉煌的城市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流氓,正坐在沅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廿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3](第22页)

在这熟悉与陌生相交织的复杂心理背后,凸显出的是生命无所归依的尴尬处境:既无法在现时城市中为自己找到生命的立足点,也无法再在乡村中找到心灵的栖息所。自我陷入“丧我”境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流浪者与文化漂泊者,一个不为人理解的双重孤独者。也正是在这种双重孤独的体验中,沈从文才激起强烈的“重造”意识。在《绿魇》中,他大声疾呼:“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4](第138、139页)他甚至提出应开展一场“清洁运动”,清扫当前一切“有形秩序和无形观念”^[2](第171页)。除去此期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不可忽视的则是由上述他对都市文明和湘西文化的双重失望而来的必然救赎,而牧歌湘西的失落,生命在具象现实中的无所依托,又促使他往“抽象”里寻求理想生命的依归,在“神之解体”时代重建生命的神性。

二、重造内涵:“美与爱”

昆明时期沈从文对理想生命的探索,主要是在“生活——生命”这一抽象构图中进行的。沈从文这里所说的“生命”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从人作为一个生物角度言,“生命”超越于“生活”,即在人的生物性外,还要具有精神层面的能力,能“违反生物原则”,“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义务”^[2](第27、42、43页)。其次,从人的存在状态言,“生命”则是不同于“生活”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沈从文这么说道:

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抽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2](第 14 页)

与此相反,“生命”是一种不被任何“名分”、“禁律”所蔽,“对自然倾心”的存在状态。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沈从文所说的“生命”承接了他前期对人性的思考,是在对“乡下人”和“现代人”生命缺陷的超越基础上进行的。上述对“生命”内涵的规定分别指向了这两点:违反生物原则,对理想有所倾心是针对“乡下人”生命缺乏主体意志而言的;生命恢复自然的存在则对应着“现代人”被各种名分禁锢的非自然状态。而如何使人性既以“自然”方式存在,又不丧失其主体意志,正是他此期关于理想生命的基本设想。

这一设想具体体现在沈从文对“美”与“爱”两个观念的重新建构上。早期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同样涉及到这两个重要概念,主要体现在他笔下“乡下人”自在的恋爱形式以及与自然合一的存在模式中,如《阿黑小史》中乡村小儿女之间纯真的爱恋、《三三》中三三那种自然式的成长。然而,由于上述沈从文对整个湘西存在模式的反思,这导致他不得不放弃在具体的“乡下人”身上寻找理想生命的因子,而选择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来诠释“爱”与“美”。下面是沈从文对“美”的理解:

在有生中我发现了“美”,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典雅词令与华美文字,与之相比都显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同样黯然无光。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想低首表示虔敬。……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2](第 23 页)

显然,“美”在这里具有特殊的内涵。任何造物都具有“美”:“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甚或“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美”通过外物显现,但又不是任一具体外物。这包括两方面的意义:其一,“美”存于任何外物中,即在“有生中”都可以发现美的存在,这说明“美”并不在于物的具体物理属性。其二,这一“美”的观念又是由沈从文对主体的绝对强调所决定的。他说:“美国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2](第 32 页)只有个体“用泛神情感去接近”,才能体验到万物的“美”。因此,与其说万物皆美,不如说是主体用“泛神情感”亲近万物,由此才体验到万物之“美”。

另一重要概念“爱”则与“美”紧密相连:“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3](第 359 页)“爱”既在于发现了“美”,更在于对“美”的彻底皈依。“爱”在沈从文这里同样不是一普通情感,而是一具本体意义的存在方式。它与人的本己存在形态即“生”与“死”不可分。沈从文这样说:“我过于爱有生一切。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2](第 23 页)“极少人能违反生物原则,换言之,便是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义务,‘爱’与‘死’。人既必死,即应在生存时知所以生。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爱就是生的一种方式,知道爱的也并不多。”^[2](第 27 页)“爱”是生的方式,但它是从对“死”的领受中显现的。人必须先行到死亡的可能性中,将死亡作为最本己的可能性承担起来。只有在对死亡的可能性的承担中,人才能承担起对自身,才能懂得如何去“爱”,去“生”。

在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中,如《看虹录》、《烛虚》、《绿魇》,他多次以抽象方式描述了这一“爱”与“美”相融合的理想生命境界。《看虹录》将女主人的身体置于生命本体地位,所要凸显的正是生命最原初的自然存在状态。身体在这里是“美”的形与线、光与色的体现,对身体的凝视则是源于对“美”的彻底皈依,即“爱”。而正是由于“爱”这一主体意志的存在,沈从文以自内的生命体验消解了外在身体实在,小说中的“身体”成了主体体验中的“身体”,而实际的具象“身体”则被抽空。从这个角度言,小说正是沈从文试验自己所构建的理想生命的场所,“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一种形式。”^[2](第 119 页)《烛虚》则多次描绘了一幅幅中“美与爱”建构的抽象画面。

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翼,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即暗哑。爱能使人暗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2](第43页)

绿树与山灵,无疑是“美”的显现。“暗哑”则是出于对“美”无言的皈依,即“爱”。如果说这里的“美”与“爱”还具有可视的承载物,那么,更多时候这一理想生命形态则表现为一种“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

试举一例。仿佛某时、某地、某人,微风拂面,山花照眼,河水浑浊而有生气,上浮着菜叶。……稍过一时,一切已消失无余,只觉一白鸽在虚空飞翔,一片白光荡摇不定。无声、无香,只一片白。……又稍过一时,明窗绿树,已成陈迹。惟窗前尚有小小红花在印象中鲜艳夺目,如焚如烧。这颗心也同样如焚如烧。^[2](第25页)

这是一存在于主体内心的抽象境界,虽然其中出现了具体存在物,如微风、山花、河畔等,但这一切都不是实在,无确切时间、地点及人物,而仅仅是“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3](第34页)。在这里,只有“美”的存在与对“美”的“爱”：“将生命从得失哀乐中拉开上升。上升到一个超越利害,是非,爱怨境界中,惟与某种造形所赋‘意象’同在并存。一切静寂只有一组声音在动,表现生命纯粹。”^[2](第88页)这才是沈从文此期所认为的理想生命形式。

三、重造困境：“抽象与实际的战争”

沈从文曾这样说：“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2](第43页)他清醒地意识到，自我构建的理想生命形式尽管符合生命自身的最高原则，却难以在现实中实现，生命的完整形式只能存于“抽象”中，以一观念形式而非事实存在于现实。这一意识与沈从文重造时所怀抱的现实目的有关，他建构的理想生命虽然看似与现实不相黏附，其背后实际上有着明确的现实因由。自20世纪30年代起，“民族品德的重构”就是沈从文思想的一个构成部分，昆明时期的他依旧将此作为生命重造的目标。在他的视野中，现代人性的沉沦，是与国民性的萎靡不振联系在一起。目前人性的沉沦状、生物状既不是人性的理想状态，同时也是阻碍民族进步的绊脚石。在《七色魔》、《烛虚》中，随处可以看到沈从文对民族人格的懦弱、虚伪、势利的批判，他直言“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2](第36页)。大后方人性沉沦的现状让沈从文感到极度沉痛甚至绝望，他此期的生命重造思考，无疑与此紧密相关。而在人的建构问题上，沈从文则认为，他所致力建构的合理生命形态，既是一理想的人性，又是民族进步的根本，即为国家民族重构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如他所说：“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情感。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2](第362页)然而，当他将这一抽象的理想生命形态置于现实中，尤其是与民族重造这一具体目标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感受到极大的精神困扰。这一“抽象”与“具象”的矛盾，始终贯穿在沈从文有关生命重造的思考中，一方面他致力于理想生命的重构，一方面由于其重构的“抽象性”，他又始终处在为“抽象”与“具象”所纠缠的困境中。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对生命的探索，很大程度是以自我生命为承载物的，在《看虹录》、《烛虚》、《水云》、《七色魔》等文本中都贯穿着极为强烈的主体意识。而这一抽象与具象的矛盾，由于始终联系着沈从文内在的生命体验，很大程度上也已经内化为沈从文自身的生命意识，外在矛盾转化为自我生命内部的矛盾。一方面，在抽象世界中“我”体悟到生命的理想境界：如《看虹录》中“我”在对身体的体验中触及到“生命的神性”；《烛虚》中所描述的“我”对类似《法华经》中“抽象生命境界”的体悟；《绿魔》中“我”与“自然”融为一体，彼此不分的生命体验。但另一方面，“我”又始终承担着“抽象”遭遇“实际”时的痛苦：如《看虹录》中的“我”的双重身份，生命在“抽象”中的“悦乐疯狂”与现实生命恢复被压抑状态；《烛虚》中对理想的“抽象”式追寻与现实“我”对理想的质疑；《水云》对自我存在意义价值的不断肯定与否定等。在“抽象”的希望与“抽象”面对“实际”时的绝望之间，生命成了一分裂的存在。在这里“抽象”既是

自我逃避现实的理想之域,生命在这里获得理想性的完美存在,但由于不断遭到“具象”的冲击,生命终又陷入一种“疯”的境地:“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1](第 43 页)这是“我”为具象与抽象的冲突所困的真实状态,是面对现实承认抽象的“虚空”,还是坚守在抽象中追寻生命的意义,“我”对此彷徨不已。生命的理想境界,在具象前是“空虚”,而对于内在生命言,则又是“具体”的^[2](第 87 页)。这一抽象面对具象时的空虚感不时侵蚀着自我生命,瓦解着自我对理想生命的建构,并对自我存在造成一种危机感。《烛虚》中这样说“我”：“心甚跌宕,俨若对生存无所自主,但思依傍一物,方能免于入渊陷泥。然当前所依傍的本身,也就正像一个往‘不可知’深渊中陷溺之物体。……生命却在下沉中。渊深无底,不易着脚。”^[3](第 114 页)显然,这里所说的“依傍一物”即为“抽象”,但这一“抽象”却难以阻止生命的下沉。然而,当“我”因意识到抽象的“虚空”而回到现实的人群中时,所面对的却又是生命的“虚伪”和“俗气”,于是“我”不得不又重新遁入“抽象”。《水云》中描述了“我”在两者间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

这似乎太空虚了点,正像一个人在抽象中游泳,这样游来游去,自然不会到达那个理想或事实边际的。如果是海水,还可推测得本身浮沉和位置。如今只是抽象,一切都超越常识感觉以上。因此我不免有点恐怖起来。我赶忙离开了树下日影,向人群集中处走去,……不知如何一来,一切人事在我眼前忽然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而且还将反复继续下去,不知道何时为止……我认为人生因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与生活。^[2](第 104 页)

正是这样一种对现实的不满,使沈从文力图摆脱现实而选择遁入抽象,他说:“一面想起这个眼前身边无剪裁的人生,虽无章次,却又俨然又物各遂其生的神气。一面想起另外一些人所抱的崇高理想,以及理想在事实中遭遇的限制,挫折,毁灭,正若某种稀有高级生物受自然苛刻特别多,不能适应反而容易夭折,不免苦痛起来。我还得逃避,逃避到一种抽象中,方可突出这个人事印象的困惑。”^[2](第 165 页)然而,一旦将抽象中的理想生命与具体现实问题相联系时,沈从文就不得不看到他所理想的“生命”只能在抽象中存在,而难以解决现实问题。他这样剖析自己:“一个人若尽向抽象追究,结果纵不至于违反自然,亦不可免疏忽自然,观念将痛苦自己,混乱社会。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3](第 42 页)可见,“抽象”既是沈从文构建理想生命的场所,又暗示了理想于现实中的难以实现。沈从文是深刻意识到这期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他对自身纠缠于抽象之域深感不安和焦虑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他的生命焦虑感很大程度也是由此而生。

昆明时期的沈从文由文学转入思想,由建构具象的湘西世界转入“抽象的抒情”,但这些转变显然都是承接上个时期而来。文学与思想在他的视野里具有同构性质,“文学家必然也是个思想家”是他这一时期多次提及的;而“抽象的抒情”一方面起于他早期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失落,一方面依旧是以早期湘西世界所独具的“美与爱”为核心要素。自此,沈从文的思考就脱出了早期“乡村—城市”二元模式,逐渐具有一种普泛意义上的人类视野。然而,他的思考点又始终牵系着具体的中国现实问题,这导致他陷入“抽象与具象的战争”中,也显示出沈从文后期思想特有的局限性。

[参 考 文 献]

- [1] 《沈从文全集》第 11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2] 《沈从文全集》第 12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 [3] 《沈从文全集》第 17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